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马振华赶到许家小学与杜步舟、周凯东商定：

趁日寇还未到达的机会，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武装，举行武装起义。两人态度斩钉截铁：“干了！”

杜步舟：打响冀鲁边抗战第一枪

□ 朱殿封

锤落砧接，“叮叮当、叮叮当”，红炉火舌欢快地舔着湿漉漉的夜空。

1937年七八月间，一到晚上，乐陵县（现为市）黄夹镇许家村刘文同闲置的院子里，两盘红炉旁就围满了观看打造大刀的人群。杜步舟看着这热烈的场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领路人，待50把大刀、50支土枪打成，咱们就拉队伍起事。

杜步舟的领路人是时任中共冀鲁边区工委组织委员马振华。想起马振华，他心里涌动起一股热流，历历往事在脑海浮现。

边区五县播火种

家境贫寒的杜步舟1909年12月出生在乐陵县大孙乡杜寺村，一家人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父亲说：“我不巴望你成秀才、举人，我是造就个‘打狗棒’啊！”

杜步舟高小毕业后，先是在黄夹镇后周村教书，又到许家村教书。他性情豪放，好打抱不平，经常为打官司的穷人写“呈子”，告过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学校的校董。其中有几场官司，反动官府慑于百姓的愤怒，居然怩办了地主豪绅。由此，杜步舟在当地名声渐起。他结交广泛，摇笔杆的、扛大枪的、说评书的、玩秤砣的、挑八股绳（挑担）的、三教九流都有，磕头结拜的盟兄弟有七八十人。

1933年2月的一天，杜步舟的荣庄朋友贾震（贾振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师大党委书记）传信让他去一趟。他从许家小学赶到贾震家，见有两人先他而至。贾震含笑指着一位身穿蓝粗布衣裤、脚着露出大拇指的布鞋，看上去不到30岁的汉子说：“他是中共津南特委组织委员马振华。”又转向另一位：“他是津南特委代理书记老苏。”

杜步舟眼睛一亮：“你就是领导乡村教师反减薪斗争、领导民众抗捐、在韩集集上打得硝黄局的税警抱头鼠窜的马振华呀？久闻大名，今日相见，真是幸会。”马振华温和地笑着点头。

英雄相惜，杜步舟的心一下子和他们亲近了。马振华和老苏对他说：“你和反动官府作斗争的事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斗争性强，勇敢，有办法。但是，靠打官司这种手段动摇不了反动统治，也容易受损失。只有推翻这个黑暗制度，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共产党就是领导民众推翻旧制度的，你要是愿意加入，我们可以做你的人党介绍人。”

杜步舟早听说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很想加入这个组织，苦于找不到牵线人，不成想今天共产党的人就在眼前。他当即说：“我愿意！”

马振华说：“那你要如实回答三个问题：你怕不怕死？”
“不怕死！”
“你可舍得下老婆儿女离开家？”
“舍得下！”
“你能不能单独完成任务？”
“能！”

马振华和贾震介绍杜步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杜步舟后来才知道，那时，贾震是中共乐陵县委书记，后任津南特委特派员。

杜步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不久接替贾震担任中共乐陵县委书记，后又任乐陵中心县委书记，负责乐陵、商河、惠民、阳信、无棣5个县的工作。4年间，5个县党员由22人发展到200多人，建立起几个县的县委、工委和党支部，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向日主枪、抢青（成熟的庄稼）、反红枣税、打盐厘、截白面（毒品）车等斗争，越来越多的民众从而认识、相信、跟着共产党。

山雨欲来，风声日紧。
1937年2月的一天，津南特委书记王奎章对杜步舟说：“汉奸殷汝耕搞了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寇有进攻平津的趋势，宋哲元动摇不定，韩复榘可能投日。当前形势动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我们应该早做准备，秘密组织武装力量，待时机成熟时开展武装斗争。”
“具体怎么搞？”杜步舟问。
王奎章说：“可能的话，组织起一个旅，至少近期也要拉起一个营。”

杜步舟立即召开乐陵中心县委秘密会议，讨论局势和研究拉队伍。他说：“同志们，现在县里国民党警备队和公安局有枪，国民党地方民团有枪，梁漱溟的乡建派领导的乡农学校（一种武装组织形式）有枪，一些地主大户看家护院有枪，民间许多个人也有枪，我们两手攥空拳怎么闹革命，打日寇？按照特委指示，我们也要拉起自己的武装队伍，只要大家努力，拉起队伍是可能的。”

会议确定，由杜步舟在黄夹镇拉起一个大队（营），乐陵二区、三区各成立一个大队，在乐陵的东辛店（现划入庆云县）、阳信的流坡坞、商河的龙桑寺这三个地方的乡农学校各成立一个大队，每个大队配备400支枪。另外，在乐陵县青训队二大队任协理员的县委组织委员孙宝智想在县城组织一个青训大队。王奎章同意这个计划，杜步舟马不停蹄地穿行五县组织实施。

正在这时，王奎章告诉杜步舟一个好消息，特委打算派他去延安学习。能到毛主席身边学习，杜步舟望眼欲穿啊！然而，拉队伍也处在骨节眼上。

情况不断在变。几天后，王奎章对杜步舟说：“经过这段时间努力，我们已掌握了一些人和枪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突然离开，对组织革命武装有一定的损失。考虑你是本地人，人熟地熟，在民众中有威望，特委决定让你留下来继续拉队伍，改派我去学习。”
杜步舟闻言心里有些着急，转念想到党员



许家村的冀鲁边区工委成立旧址

应以党的事业为重，就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但他有些担心地对王奎章说：“我是个穿大褂的‘教书匠’，要笔杆子还凑合，要枪杆子搞武装可是外行，你走了，我怕完不成党的任务。”

王奎章热情地鼓励杜步舟说：“在干中学嘛，没有天生就会的，相信你一定能挑起这副重担。我走后，马振华同志接替并领导这里的工作，上级党还派军事干部来。”杜步舟听了，心里踏实多了。

几天后，杜步舟去古楼张村与中共山东省委派来的入接头，原来是多年未见的小学同学赵明新。接着，又去惠民中学接来延安派到山东的8名红军军事干部之一的周凯东（原名周发海，化名黄耀轩，后任八路军太行军区第4军分区3团团长，1943年8月18日在攻打河南林县县城时不幸牺牲，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津南特委交通员邸玉栋接来山东省委派来作领导工作的于文彬。他们的任务是组建鲁北特委。

杜步舟安排于文彬隐蔽在共产党员刘秉文的小药铺里。将周凯东隐蔽在他最早发展的共产党员、许家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第一任中共黄夹区委书记刘文同的小杂货铺里。据刘文同之子、今年82岁的刘芝莲回忆：因周凯东外地（陕南）口音，为避免暴露身份，对外说他是逃荒的难民，给刘文同家的杂货铺帮工。出去工作时，以卖货作掩护，刘文同推着杂货货的鬼头车（独轮车），周凯东拉车子。

而后，周凯东搬到村民刘万春家的东耳屋隐蔽。据现在村里的刘文成老人回忆说：“周凯东后来拜刘万春为干爹，刘万春给周凯东说了孟灶户村的一个姑娘做媳妇，喜事在小东屋办的。”

许家小学，群英汇聚。
冀鲁边区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1937年5月的一天在杜步舟住的那间小屋召开，于文彬、马振华、赵明新、周凯东、邸玉栋、杜步舟和宁津县委政治交通员王其元共7个人参加。会上，于文彬传达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成立鲁北特委的指示，马振华汇报了津南的政治、经济、对敌斗争形势及津南特委几年来的工作情况。经过讨论，大家认为鲁北党的基础比较薄弱，决定不成立鲁北特委，撤销津南特委，成立中共冀鲁边工委，选举于文彬任工委书记，马振华任组织委员，赵明新任宣传委员，邸玉栋任特派员，杜步舟任工委团委书记兼乐陵中心县委书记。每人作了具体分工，周凯东任乐陵中心县委军事委员，具体协助杜步舟拉队伍，组建革命武装。

冀鲁边名称由此确立，广袤大地上遍布火种。

黄夹镇上举战旗

“叭”！
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日寇展开全面侵华战争。

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领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3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冀鲁边区大地在愤怒燃烧！

600万冀鲁边区民众的仇恨在心中愤怒燃烧！

负责筹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马振华赶到许家小学，他与杜步舟、周凯东商定：趁日寇还未到达的机会，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武装，举行武装起义。两人态度斩钉截铁：“干了！”

打鬼子，人为本。
当时杜步舟领导的乐陵等五个县的情况是：东辛店、流坡坞、龙桑寺三个乡农学校的三个大队已经拉起来了，这三个学校的校长是县委书记，每个大队有三百四十支枪；乐陵国民党党部组织地子弟成立的青训队里有地主花钱雇用的贫苦子弟，孙宝智所在的二大队有机会便拉出一部分队伍来，拉不出来便设法将其瓦解。杜步舟依靠后周、许家两个村的党支部，组织了三四十名教员，另外，黄夹镇的国民党段局子有17支长短枪，他们也被争取了过来。

14岁参军周凯东，历经蒋、冯、阎大战，江西宁都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大智大勇，从士兵升任团长，有丰富的斗争、作战经验。他向杜步舟分析说：“那三个乡农学校，虽说校长、教务长是我党党员，但要真正把队伍掌握在党的手里，听党指挥，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孙宝智从青训队拉出队伍就更困难了。我们这里前段工作成绩很大，问题是教员太多，比较脆弱。至于段局子里混事的人，

多数政治面目复杂，经不起革命斗争的风浪，一遇风吹草动便动摇妥协。我们的队伍应该以农民为主，尤其依靠贫雇农，作为队伍的中坚力量，也吸收小学教员和一部分局子里的党员和苦大仇深的人参加，这样才有战斗力。”

响鼓不需重捶。杜步舟对周凯东说：“你的意见对，就这样干。不过，农民子弟中也有劣顽分子，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我们再加个上‘三不要’：爱钱财的人不要；嫖女人的人不要；吸毒品的人不要。”

时局动荡，鱼龙混杂。杜步舟和周凯东为预防不测，拉队伍先不公开共产党的“身份”，打着成立“乡村自卫队”的旗号：日本鬼子要来了，我们组织起来保卫家乡，有人出钱，有钱出钱，有物出物。

许家，这个仅有7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的小村子，杜步舟直接发展和受其影响，抗战前至抗战期间有57人入党（后1人叛变），有7人为国捐躯。

村民梁义发唱戏演黑头包公在当地有名，他学包公一腔忠肝义胆。那天他把儿子棗曰红



中共乐陵工委在后周小学开会，决定组建县委

（后任115师教导六旅三营排长，烈士）领到杜步舟跟前说：“我把儿子交给你了，跟着你去打小鬼子。”

棗曰红是杜步舟发展的党员，他的学生，在家是独生子，他娘去世了。杜步舟说：“当兵打仗，战场上子弹不长眼，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家就断后了，他不能去。”

梁义发说：“我都想到了。我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还知道忠心报国是大孝至孝。小鬼子来糟蹋咱，国要是亡了，那得有多少人人家要断后呀？啥也别说了，你就带他走！”

杜步舟见梁义发铁了心，又对棗曰红说：“当共产党的兵，一生是‘二士’：活着是战士，死了是烈士，可要有决心啊！”

棗曰红说：“老师，放心吧，红旗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几天后，梁义发又把他的两个外甥孙子大林（刘汉玉，1939年许家战斗中牺牲）和小林（刘汉臣）送来。刘汉玉兄弟俩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

村民刘万春与杜步舟脾气相投，交情深厚，冀鲁边区共产党领导人马振华、赵明新、邸玉栋、张墨仙、于文彬、周凯东都住过他家。他将次子刘文和、长孙刘鹏（原名刘芝梅）送到“乡村自卫队”。

还有村民刘延龄、刘志安（原名刘治安）、刘延明三兄弟……杜步舟很快组织起100多人的队伍，由周凯东负责军事训练。

打鬼子，需要枪。
杜步舟对于文彬说：“‘乡村自卫队’只有20多支枪，人多枪少。”于文彬说：“宋哲元、韩复榘都有兵工厂造武器，我们就不能自己搞武器吗？”

杜步舟豁然开朗：“对，我们可以打大刀、造土枪呀。”

“好，试试。”于文彬赞同说。

打造刀枪需要钱买铁。杜步舟算了一笔账：打1把刀，得1元；打一支枪得5元，各打50把（支），至少需要300多元。到哪里去筹这些钱？

杜步舟把情况对党员们一说，大家齐声说：“没钱买铁，不怕，大家凑。”那时，党员交费每月一个铜板。大家一合计，那个月每人交一元，共凑了100多元。

钱还不够。杜步舟想到了“请会”——民间习俗，穷人有事需要钱，摆上酒席请大伙帮忙凑钱。参加会的叫“随会”，大家都是“会友”。第一个请会用钱叫“会主”，一般每个“会友”拿五元到十元，以后每逢清明或重阳再抽签决定谁当“会主”。

杜步舟同学的父亲苏同恩是黄夹镇上的牲口经纪，外号“黑台柱”，社会交际广，同大户来往多，他请苏同恩出面帮助操持。第一个会在苏同恩家里请，那天是黄夹集，杜步舟办了两桌比较丰盛的宴席，随会的有县衙门的小官吏、买卖铺子店掌柜、教员及富裕些的农民20多人。席间，杜步舟殷勤地给各位“会友”满酒，酒过三巡，他站起身躬手一揖说：“诸位会友，近日步舟家中不幸遭灾，急需一笔款项，有劳诸位相助，步舟深表感激。”之后，杜步舟又请了一次会，两次“请会”筹得了300多元。

据刘文同的儿子刘芝莲回忆，此间其父卖了3亩地，又向小海李村的地主借了200大洋的高利贷，帮助杜步舟筹集武装起义经费。1940年，刘文同在庆云县城南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40岁，是乐陵县著名烈士之一。

然后，杜步舟找许家村铁匠周师傅商量说：“老周师傅，你看搞点土枪、大刀看家自卫怎么样？”

络腮胡子、红黑脸膛的周师傅一拍胸脯，哈哈笑着说：“菜刀能打，铡刀能打，大刀，当然也行了。”杜步舟把打刀枪的事儿说了，周师傅满口应承：“行。我一盘红炉太慢，再叫上后周村的铁匠张师傅一块干。”

二位师傅各带三四个徒弟，晨迎朝霞，晚披星月，“叮叮当，叮叮当”的钟声震动了冀鲁边大地。杜步舟又请了一个姓陈的小炉匠，用火药和铝制造了一批“电光子”（一种土枪子弹）。

至此，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人，有了；刀，有了；枪和子弹也有了。杜步舟向工委马振华等领导汇报后举行武装起义，他扯了一个大红被面做了一面大旗，队员们把大刀磨得锃亮，刀柄上的红绿绸布随风飘动。

这是一个载入历史史册的日子！
1937年8月13日清晨，黄夹镇上扬起了一面鲜红的大旗，上书“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六团”。红旗下，团长杜步舟、副团长周凯东、

周凯东从心里爱护这位革命战友，第一次参战便是短兵相接，怕他有闪失。
杜步舟知道周凯东是好意，但他没有听从。他想：团长打仗不上前线，以后怎么带兵？等周凯东走后，杜步舟带上一个班向叶茂李村扑去。

这些行动震惊了驻惠民县的日寇，于是组织惠（民）、商（河）、济（阳）、临（邑）4县近2000名步兵、一个骑兵团，配备4辆坦克、3架飞机，赶来“扫荡”。一天，杜步舟率三营同临邑县政府工作人员在刘渤海村与日伪军接火，战斗从早晨打到中午，三营战士接连两次击退敌人进攻。下午3点，日居中，伪军在左右，以更凶狠的火力发起攻击。杜步舟沉着指挥，集中神枪手专打鬼子，使敌人乱了方阵，又一次退回去。

接近黄昏，杜步舟得到情报，鬼子又到济南调兵去了。杜步舟趁敌军等待援兵，让部队掩护村民一起撤离了村子。第二天清晨，敌人扑进村，一个人影没见着，只捡了些弹壳。鬼子气得哇哇乱叫：“八猴子，神出鬼没的。”这一仗八路军牺牲2人、伤16人，毙伤日伪军200多人。

是年6月的一天，杜步舟带领九连和两个机枪班从商河城东北的曹胡庄，行军80里插入城西南的王天弼村，与鲁北支队五大队相遇。五大队指导员杜冠群对杜步舟说：“关公寺据点的白老八活动猖獗，经常出动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民众恨之人骨，杜营长能不能狠狠地揍白老八这个汉奸？”

杜步舟知道五大队虽有150多人，但新战士多，战斗力较弱，对付不了白老八，当即答应了。他和其他几个干部察看地形，分析敌情，决定让五大队作“诱饵”，移驻王天弼村南3里处的大张村，三营在王天弼村设伏打击敌人。

安排就绪，大张村联络员给白老八送信。白老八听说村里来了五大队土八路，正在饭前做饭，马上集合队伍，并去报告垛庄石桥的鬼子。他没等鬼子出动就带着伪军直奔大张村。五大队集中火力一阵猛烈射击，然后佯装溃败向王天弼村东南撤退，诱敌进入九连的伏击圈。不料，垛石桥的鬼子赶来，鬼子队长令白老八留在大张村搜索五大队的零星人员，他亲率鬼子兵在前，警察分局的警备队在后，顺大道向五大队追来，气势汹汹连追带喊：“土八路，一个不剩，统统消灭！”

等鬼子全部进入九连的有效射程，杜步舟一声令下，交叉火力齐发。大道上无处可以隐蔽，鬼子趴在大道上成了活靶子。鬼子、警备队80多人半小时报损，只有鬼子队长负重伤逃命，他大骂上了白老八的当，报告给济阳县城的鬼子官：“白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杜步舟带领战士转移到王天弼西北的大程村。济阳县城的鬼子中队长雪野带队赶到王天弼扑了空，又转到大张家村。此时，白老八的伪军正在翻箱倒柜抢掠，吊打群众。雪野叫白老八集合队伍，把枪架起来。雪野大骂白老八私通八路，谎报军情，说：“垛石桥的皇军统治完了，你们怎么一个死的也没有？我叫你们统统的死了！”雪野下令开枪射击，白老八及一百八十多个伪军，只有一个号兵因上厕所躲过一死，他在枪上挂块白布跑到九连报告此事。战士们风趣地说：“好好谢谢‘皇军’，他们替咱消灭了白老八。”

打盘山、袭庆云、占无棣、火烧敌炮楼、鏖战武家集、浴血徒骇河……

从首举义旗到抗战胜利，杜步舟率领的“老三营”（称“老六团”）虽屡改改编、更名，但一直是冀鲁边的抗战主力，立下了赫赫战功。1945年3月，杜步舟被增补为中共七大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山东省林业厅副厅长、山东省政协常委等职，1994年病故。冀鲁边区老八路郑正（曾任扬州市副市长，创办《扬州日报》）作《赠杜步舟》诗赞曰：“黄夹战旗映天红，能打能转老三营，至今历历传佳话，今日喜存老英雄。”

周凯东对杜步舟说：“你这个教书先生以前没有动过真枪真刀，这次别参加了。”周



中共津南特委决定成立乐陵中心县委